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旅游管理核心课系列教材

★ 魏翔 著

休闲经济与管理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OR LEISURE TIME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旅游管理核心课系列教材

休闲经济与管理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FOR LEISURE TIME

魏翔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休闲经济与管理 / 魏翔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旅游管理核心课系列教材)

ISBN 978-7-303-14117-3

I. ①休… II. ①魏… III. ①消费经济学—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F0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8575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邮箱 beishida168@126.com

XIU XIAN JING JI YU GUAN LI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15.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策划编辑: 高玲 责任编辑: 高玲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旅游管理核心课系列教材

编写指导委员会

主 任 申葆嘉 南开大学商学院旅游学系教授 “中国旅游教育
与研究终身成就奖”唯一获奖者

副主任 魏小安 中国旅游研究院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
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央民族大
学博士生导师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Larry Yu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 教授

Liping Cai 美国普渡大学旅游与酒店系主任 教授

李天元 南开大学旅游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邹统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宋海岩 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殿廷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罗明义 云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原云南省
旅游局局长

谢彦君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
导师

目 录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无快乐的经济 /1

【学习目标】	1
第一节 问题导出	1
第二节 国富是为了民乐	2
第三节 国民幸福总值	3
【复习与思考】	11

第二章 快乐经济学 /12

【学习目标】	12
第一节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及研究方法	12
第二节 对快乐的理解	15

第三章 休闲与幸福感 /19

【学习目标】	19
第一节 休闲的含义	19
第二节 关于“畅”	22
第三节 休闲的体现	23
第四节 对幸福感的研究	25
第五节 对幸福指数的片面理解	27
【复习与思考】	28

第四章 时间构成与休闲的互补效应 /29

【学习目标】	29
第一节 时间的构成	29
第二节 业余时间中的“休闲”	30
第三节 时间构成与休闲的互补效应	30
第四节 休闲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33
【复习与思考】	36

第二篇 休闲的微观经济机理

第五章 效用函数：休闲对效用函数的改造 /37

【学习目标】	37
第一节 休闲与工作的关系	37
第二节 休闲对效用函数的改造的根源——互补效应	42
【复习与思考】	46

第六章 劳动力市场：闲暇选择与劳动力选择 /47

【学习目标】	47
第一节 闲暇效应对劳动力市场的修正	47
第二节 家庭博弈中的闲暇	51
第三节 闲暇选择与效率工资	52
第四节 闲暇对劳动力政策的影响	53
【复习与思考】	54

第七章 消费理论：休闲对消费的影响 /55

【学习目标】	55
第一节 基于休闲的静态与动态消费函数模型	56
第二节 实证检验：中国的数据说明了什么	63
【复习与思考】	68

第八章 厂商理论：休闲安排如何改变厂商决策 /69

【学习目标】	69
--------------	----

第一节 休闲对厂商成本的影响——“休闲—产能约束”模型	69
第二节 休闲如何影响企业效率	71
第三节 博弈：闲暇效应：扩展到“企业—员工—企业”三方博弈	73
第四节 博弈分析：闲暇效应与企业增长的内部动力及外部动力	78
【复习与思考】	80

第九章 休闲产业的范畴和内容 /81

【学习目标】	81
第一节 休闲产业的范畴	81
第二节 休闲产业链	82
第三节 休闲产业内容	82
【复习与思考】	92

第十章 休闲产业化 /93

【学习目标】	93
第一节 休闲与休闲产业	93
第二节 一个典型：休闲地产	97
第三节 休闲产业和产品的发展与管理	101
【复习与思考】	109

第三篇 休闲的宏观效应

第十一章 经济增长：休闲使经济增长更复杂 /110

【学习目标】	110
第一节 休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悲惨式增长”到“快乐式增长”	110
第二节 基于休闲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式	116
【复习与思考】	140

第十二章 休闲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141

【学习目标】	141
--------	-----

第一节 休闲、休闲效应对于长期产出波动的影响：“休闲—产出交互作用”——经济波动的稳压器还是加速器	142
第二节 休闲、休闲效应对短期产出波动的影响	148
第三节 休闲时间与需求冲击	153
第四节 休闲、休闲互补效应与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关系	156
【复习与思考】	158

第十三章 休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159

【学习目标】	159
第一节 模型建立：考虑休闲与不平等的离散时间模型	160
第二节 模型求解：稳态增长率的确定	162
第三节 证明与分析：不平等、休闲时间与长期增长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163
【复习与思考】	164

第十四章 效率：不得不考虑休闲 /165

【学习目标】	165
第一节 休闲沟通了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165
第二节 跨国比较：效率与公平的兼顾	167
【复习与思考】	172

第五篇 休闲管理与休闲政策

第十五章 理论根基：工作—闲暇平衡 /173

【学习目标】	173
第一节 工作—闲暇平衡的基本概念	173
第二节 工作—闲暇平衡的影响效应	177
第三节 工作—闲暇平衡的制度安排	178
【复习与思考】	182

第十六章 国民休闲与带薪休假 /183

【学习目标】	183
第一节 国民休闲计划	183

第二节 带薪休假	195
【复习与思考】	199
第十七章 弹性工作制 /200	
【学习目标】	200
第一节 弹性工作制的基本概念	200
第二节 实践中弹性工作制的优点与问题	202
第三节 弹性工作制提升个体效率和企业效率的作用机理	203
第四节 对弹性工作制的效果评价	206
第五节 弹性工作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209
【复习与思考】	210
第十八章 从两方博弈到三方博弈演进中的企业管理创新 /211	
【学习目标】	211
第一节 两方博弈下的企业管理	211
第二节 三方博弈下的经济行为与管理实践	213
第三节 三方博弈引发的闲暇效应的深刻含义	222
【复习与思考】	224
参考文献 /225	

第一篇 导论

第一章 无快乐的经济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富与民乐的关系；
2. 了解国民幸福指数；
3. 了解日本经济低迷对中国的启示；
4. 掌握中国经济问题和民生问题的辩证关系。

第一节 问题导出

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发展中期，一部分地区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少数地区进入后工业化时期。随着我国国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生产将不再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内容，推动经济增长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将集中在服务经济和闲暇经济理论内。人们现在越来越关注生活的幸福指数，闲暇观念和对闲暇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休闲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现今，很多发达经济体开始走向闲暇经济，以美国、瑞士、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为典型代表。这种转变非但没有阻碍其经济的增长，而且提高了其国民的生活水平，增进了经济发展质量。中国也在今年提出了关注民生经济、创建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那么，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使经济的增长与人们的幸福感不相矛盾是今后我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熟悉经济学的人可能都知道，西托夫斯基是最早将心理学成果运用于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1976年，提勃尔·西托夫斯基发表了自己最负盛名的著作《无快乐的经济》。无快乐经济的主要观点是收入与快乐没有密切的关联。其一在于快乐与社会地位关系大，与个人绝对收入关系小。其二，收入常常是做不愉快事情的报酬，收入高意味着做不愉快的事情多。无快乐经济学分析了人类动机和满足的心理学，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经济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繁

荣未能使它的受益者感到满意,并研究,是什么力量驱动着人们、人们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未获满足的需要能够解释人们——甚至那些富人——的不满,为什么现代的年轻人和失业者那么容易转向毒品,为什么暴力呈现上升趋势等社会问题。西托夫斯基认为,人们需要保持忙碌,但由于无法找到使他们保持忙碌的合适刺激,于是感到无聊。这种情况困扰着那些悠闲的人们,但目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还不能让每个人既摆脱无聊,又可以找到健康的方式来摆脱无聊,因此是无快乐的经济。西托夫斯基指出人类心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我们的唤起水平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我们体验痛苦或快乐,是在体验不同的唤起水平,而各种快乐是唤起水平的累加。人格和相应的唤起水平(舒适感)对应:外向者的平均唤起水平高(因此他们更容易达到舒适),内向者的平均唤起水平低(因此他们更难达到舒适)。因此,不同的人格的消费模式不同,所以不同唤起水平(不同的舒适感水平)影响着消费模式:外向者对咖啡、茶等刺激品的消费较高,内向者对酒精等镇静品的消费较高。唤起水平和我们的幸福感有很大关系,其内在规律是:过度刺激及其导致的极度唤起是令人不快的,过少的刺激也令人不快,并让人寻求更多的刺激。心理学家假定有一个最佳的唤起水平能导致舒适的感觉。这个水平大概不是固定的,它随清醒周期波动:当刺激量低于最佳水平时,会导致无聊的感觉;高于最佳水平时,会导致紧张、疲劳或焦虑。最佳水平最好被解释为某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平均值,而非某一时刻的精确值。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2003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最新幸福指数调查,东亚国家幸福指数普遍低于西欧及美洲国家,最快乐的亚洲国家新加坡也只排名第25位,中国则排第48位。而在各种对全球各国国民快乐水平的比较研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总是排在后列。

第二节 国富是为了民乐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当前全国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已经是劳动性

收入(城镇工薪收入和农村经营性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也就是说,当一部分人还在努力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时,另一部分人已经可以坐享财产带来的收益了,而且前者增长的速度远不及后者。

中央及时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第一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四位一体。”中国科学院程国栋院士评价道。

1999年,盖洛普公司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意调查,60个国家的5.7万名成人参加。调查的题目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结果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认为,身体健康和家庭幸福比其他任何东西更为宝贵(健康需要在闲暇时间内增进、家庭幸福的维持与培育需要在闲暇时间内进行,闲暇时间保证个体可以自由做自己觉得最幸福的事情——维护健康和家庭幸福,当然,物质保证是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目标函数,而传统经济把它当做目标函数)。

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快乐,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快乐,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快乐,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快乐,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快乐。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同时,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

第三节 国民幸福总值

在国际社会,出现了对国民幸福总值测量的标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最早是由南亚不丹王国国王旺楚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他提出,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践的结果是在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不丹,人民生活得很幸福。

20世纪70年代不丹提出GNH时并不引人注目,然而20多年的实践已经引起全世界瞩目,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创设了“国民发展指数”(MDP),考虑了社会、环境成本和自然资本。日本也开始采用另一种形式的国民幸福总值(GNC),更强调了文化方面的因素。

获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和经济学家联手正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的研究。当下中国，绿色 GDP 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中国发展观念的转变，不能满足于仅在技术层面上给 GDP 涂点“浅绿”色，要从发展的观念、生活方式的转变中探寻发展引起问题的病因，崇尚人类文明的创新和变革，从发展的机制上预防问题的发生，引导人民迈向幸福。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世界上存在着唯一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创造最高质量的生活必须超越经济增长的‘一叶障目’。”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做英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时说。萨摩斯岛人伊壁鸠鲁是快乐哲学的先哲，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如果我把口腹之乐、性爱之欢、悦耳之娱、见窈窕倩影而柔情荡漾一概摒弃，那我将无法设想善为何物。”他用富人们赞助的钱建了一所哲学学校，学习快乐之道，他开列的“快乐需求清单”包括三样东西：友谊、自由和思想。

各种研究都表明，收入决定快乐的比重仍不超过 2%。在同一个国家里，钱多快乐多这种正比关系会逐渐地消失。比如，1940—1998 年，美国的人均收入翻了近 4 倍，然而感觉到快乐的人占总人口的比率平均都维持在 30% 上下，且没有表现出任何上升的趋势；在日本，1958—1988 年人均收入增加了 5 倍多，可是快乐人口的平均比率是 59%，也没有上升趋势。

事实上，闲暇也是一种消费。人类为了一种消费（支持生命体存在的物质消费）而牺牲另一种消费（闲暇），是人类生活本身发展的一对深刻矛盾。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以为人类具有喜好劳动的基因，这是错误的。闲暇是十分重要的，是人的生命本质的体现，人的生命价值之一在于寻找快乐，大多数情况下，闲暇可以带给人们很多快乐的机会。

必须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原则，这是英国经济伦理学家边沁和穆勒福利经济学的思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让最大多数国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喜悦。社会经济发展的真正目的与最终意义只在于使人类获得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因此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能以牺牲多数国民的身心健康为代价，经济的发展模式不能不断增加国民的痛苦，而是要追求不断增加的国民快乐总值。

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四十年或更长的时期，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而且长期没有增加。1958—1987 年，人均实际收入增加 5 倍多，而快乐指数没有增加。

日本经济约从 1988 年开始停滞或低速增长, 根据 1994 年的调查, 日本快乐指数, 在各国的比较中, 已经从末位增加到中下的水平^①。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几十年或更长的时期, 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差不多是全世界最低的, 而且长期没有增加。1958—1987 年, 人均实际收入增加 5 倍多, 而快乐指数没有增加。根据 2002—2004 年的调查, 日本快乐指数已经到达中等至中上水平^②。这可能有其他原因, 但原因之一大概是, 日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 拼命挣钱并不一定获得快乐。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百害而无一利”, 并引用日本的例子, 认为: 日本的经济停滞是由于汇率增值造成的。其实, 日元远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有大量的升值, 而经济继续高速发展,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才开始停滞或以很低的速度增长。这有如下原因。

第一, 日本已经成长到了大笨象阶段(根据林崇椰教授的发展的乌龟—飞马—大笨象三阶段论), 增长速度理应减到低速度。第二, 日本有一些金融的问题, 包括银行贷款受到人情与权力的影响等。第三, 日本向来有很高的储蓄率, 加上日元升值, 投资者把资金投到外国。因此, 日本拥有大量的海外资产。这些海外资产的回报, 没有被计算进日本的国内总产值中, 但却属于日本人所有。日本近十多年来的所谓经济停滞, 是根据国内总产值来算。如果统计包括日本国民在国外净收入的国民生产总值, 则数字要大得多。

当然, 中国的情形和日本完全不同,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停滞。其实, 即使是发达国家, 升值也未必会使成长减速。例如澳大利亚元对美元汇率从约三四年前的 1 澳元兑 48 美分及两三年前的 56 美分增加到 2005 年 9 月的 76 美分左右, 增值接近 60%, 而其经济仍以高速发展(以发达国家水平而言), 而且房地产与股票的价值指数都增加将近一倍。

按照 Cummins 1998 年发布的调查结果(这项调查综合了 1990 年之前二十年的快乐水平), 以区域和文化分类, 北欧国家的快乐得分最高, 英语国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爱尔兰位居第二, 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包括巴西位居第三, 中东、南欧和东欧(希腊、俄罗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位居第四。但是,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较为贫穷的印度次大陆和非洲并非居于末位。在人均收入水平较高、较为富裕的南欧和西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快乐得分却明显地低于非洲。快乐得分居于末位的是东亚国家, 其中收入水平世界领先的

① E. D. Diener, R. B. Diener. New direction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 cutting edge[J]. Indian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 27(1).

② 黄有光. 人民币应该早日升值! 日本不是一个反例(11).

日本敬陪末座。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是印度的 82.4 倍，即便不使用汇率而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收入依然比印度高出 16.4 倍。但是，印度与新加坡的快乐得分却完全相同，并且两国的快乐得分都明显地高于日本。

日本经济约从 1988 年开始停滞或以低速增长。从 1987 年开始的 15 年间，日本的平均工作时间平均每年减少约 0.7%，累积减少超过 10%。这闲暇的增加，也没有被计算在产值内。

日本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停滞或低速增长，被多数人认为是大坏事。其实，对日本人民与全世界都有利。如果日本经济停滞是由于汇率增值造成的，汇率增值的利益大矣！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经济，必然是一个缺乏快乐的经济。没有文化的产品和服务仅仅能够使我们更加舒适，但却可能使我们感觉极其乏味和无聊。而快乐和幸福才应该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只有每个消费者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换句话说，变得“更有文化”，他们才能够从经济服务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我们也许能够找到目前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是从 1953 年开始以五年一个时间段来做国家的中短期规划的，“一五”计划期间，也就是从 1951 年或者是 1952 年至 1957 年，中国用非常短的时间建立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后来改革这个体制花了更多时间。1985 年、1986 年制订“七五”计划时有重大的创新，首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规划——过去的五年计划都是关于经济的计划，这是第一次引入了社会发展规划。“十一五”规划是以社会发展为主，它的第一步实际上是从 1986 年开始的。其次就是它第一次提出了十年远景规划与五年中期计划相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内容表明中国在创新自己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简称为“中国之路”。它的核心就是“发展是硬道理”。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在今天看来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就是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创下了现代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的最高发展速度记录。我们从 1978—2004 年，26 年的时间，经济总量，也就是 GDP 总量年平均增长率是 9.4%。还有日本，日本在 1950 年至 1973 年，23 年期间大体经济总量，也就是 GDP 总量年平均增长率是 9.2%。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已经不是是否要加快发展的问題，而是如何发展的问題；不是要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问題，不是量的问題，而是要明显地改善发展质量的问題。这就需要转

“所谓“新发观”，要创新自己的发展道路，转入全面、协

“十一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主要是经济增长、增长质量

改革开放、教育科学、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

和民主法制等方面。

其中第二个目标，就是资源利用效率要明显提高，单位能耗要比“十五”末期，也就是2005年末期降低20%。这可能是所有目标中最难以完成的。最后一个目标，也就是第七个目标：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社会治安和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好转，构架和谐社会取得新进步。我想特别提出的是社会治安。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犯罪案件率增长最快的，它们分别为10.8%和8%，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我们希望这方面有更加明确的指标，将来我们考核各级地方政府，不仅要考核GDP，而且要考核犯罪率、污染排放率等和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指标。

西托夫斯基指出，除了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还有一些服务并不通过市场。这些产品和服务被免费提供，它们的互惠性和平等的分配被习惯、传统、社会舆论、家规和法律所保证。这样提供的公共服务包括强迫兵役，还有类似的强制性公民义务如紧急情况下的救火和参加陪审团的义务。非市场的私有产品和服务范围广泛，从农家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食品，到父母和姻亲原来所提供的建议。现在这些建议更多地是由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分析家通过市场来提供。高度的专业化、高度的流动性，以及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已经极大地消弭了这些非市场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性。但它们绝不是可以忽视的，而且其中的一项——在家庭里或在朋友中间提供的家务劳动和服务——甚至还在增多。如果非市场性的家务劳动的价值确实比其他的非经济性满足小，但却不比来自市场的产品和服务所提供的满足小，那么，经济产值的（提供满足的）价值肯定要小于人类全部的非经济性满足。如果如此多的为人类的满足作出贡献的服务都被排除在国民生产总值之外，我们为什么还如此看重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一个原因是国民生产总值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这样一种信念，或者叫做希望，即国民生产总值的改变会与人的整体幸福感呈正相关。这是因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改变不会影响人的非经济性满足，或者至少不会引起非经济性满足的补偿性改变。我们这样的观点——国民生产总值水平的变化没有改变幸福总量是值得讨论的^①。

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发展，目前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3 200美元，按照国际标准，当人均GDP达到3 000美元以上便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这一时期的发展思路与过去不同。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这当然不是说，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百

① [美] 西托夫斯基. 无快乐的经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3-74.

姓的生活没有提高，而是指相对于 GDP 的增长，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富裕程度没有 GDP 增长快。何况，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中国至少还有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因此“十二五”规划应明确提出富民的目标和任务，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跟贫富差距和民众的普遍不富裕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问题、消费和内需不足的问题，乃至一些群体性事件，都有着贫富分化的影子。贫富分化甚至直接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所以，“十二五”规划政策的着力点应该转到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 and 战略，围绕着如何“富民”的问题，制定行动路线图。而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也已经为解决“富民”问题提供了物质基础。民乃国之本，对于“民富与国强”的关系，是先有民富而后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多少国家兴衰的历史也告诉人们，民富虽然不必然等于国强，但民不富，国家必然不强；即使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强，也只能是外强中干。只有建立在普遍民富基础上的强大，才是根本性的强大。因此，中国政府需要更新观念，在政策上，把“富民”作为一个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有必要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福利的战略规划，这个战略规划的目的，是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福利国家打下基础。

“富民”虽然是一个经济问题，但经济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事实上，改革以来贫富差距的形成和拉大本身就有政治因素在内。为什么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不到同步提升？症结就在于蛋糕的分配不合理。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成果的最大受益者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政府及其与公权力有关联的利益群体，以及资本利益集团和垄断国企的经理层与员工等。而政府之所以能够抽走国民收入的大头，并随心所欲地支配财富而不受监督，资本之所以能够压制众多的劳动力，原因又在于政府的权力过大。

中国传统上本就是一个大政府国家。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心中都存在一个大政府观念。所以，要在政府权力过大的情形下改变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状况，须将之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看待，否则，仅仅视之为一个经济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另一方面，尽管“富民”问题在未来 5 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非常重要，但毕竟不是事物的全部，不能代替其他问题的解决。正如本文开头所说，在官方看来，“十二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等诸种结构构成的结构难题。结构问题在中国来说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十二五”规划还是把它列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这说明，结构问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造成的危害不能再延续下去。